

社会网络与社会融合对农村流动妇女初婚的影响^{*}

——来自上海浦东的调查发现

靳小怡¹, 彭希哲², 李树茁¹, 郭有德², 杨绪松³

(1. 西安交通大学 公共政策与管理学院 人口与发展研究所, 陕西 西安 710049;

2. 复旦大学人口研究所, 上海 200433; 3. 西安交通大学 管理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49)

摘要: 本文利用“浦东新区外来人口调查”数据, 定量研究了社会网络、社会融合以及流动因素对妇女的理想婚龄、实际婚龄和初次流动后5年内结婚风险的影响。研究发现, 社会交往、居住环境和在城市的滞留时间对妇女的初婚年龄均存在显著影响。本文的研究有助于理解农村流动人口初婚观念与行为转变的过程、途径和机理。

关键词: 社会网络; 社会融合; 初婚年龄; 流动妇女; 浦东

中图分类号: C924.2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0-4149(2005)05-0053-06

Impacts of Social Network and Integration on First Marriage of Female Rural-urban Immigrants: Evidence From Survey in Pudong, Shanghai

JIN Xiao-yi¹, PENG Xi-zhe², LI Shu-zhuo¹, GUO You-de² and YANG Xu-song³

(1.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and Development Studies,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Administration, Xi'an, Shanxi, 710049;

2. Institute for Population Studies,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Abstract: Using data from the survey for temporary immigrants in Pudong,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effects of social network and social integration, as well as migration factor on desired and actual age at first marriage and hazard of first marriage within 5 years since the date of migr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frequent communicable persons, housing conditions and duration staying in cities have significant effects on women's age at first marriage. The findings help to understand the process, approaches, and mechanism of first marriage transition of the temporary rural-urban immigrants.

Keywords: social network; social integration; age at first marriage; female temporary immigrants; pudong

一、研究背景

社会网络是一个人同其他人形成的所有正式与非正式的社会联系, 也包括了人与人直接的社会关系和通过物质环境和文化的共享而结成的非直接的关系^[1]。农民向城市流动, 带来了职业、

收稿日期: 2005-04-06

^{*} 本研究部分受国家社科基金资助(04BRK001)

作者简介: 靳小怡(1973-), 女, 河北藁城人, 西安交通大学副教授, 主要从事婚姻与家庭研究。

生活环境和生活方式的巨大转变，经历着再社会化和重构社会网络的过程。农村流动人口社会网络的再构建，具有从以亲缘、地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逐渐向友缘和业缘为纽带的社会关系转变的特征。在与重构的社会网络的互动中，农村流动人口的观念和行为逐步融入到城市的主流社会中^[2]。从社会关系和社会关系网的角度研究农村流动人口，能够更好地理解其观念行为的变迁^[3]。目前，对于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网络及其影响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求职过程和获取社会经济地位方面。

与社会网络密切相关的是社会融合。王春光^[4]在研究移民问题时指出，社会融合是指移民与当地社会的关系。由于户籍制度决定了农村流动人口与城市居民在身份上存在着本质差别，农村流动人口更容易陷入贫困状态，并由此导致在社会关系、心理、文化和政治参与上长期被隔绝，并逐渐被边缘化，而社会网络的欠缺会进一步限制他们与城市主流社会的融合。有研究显示，社会融合程度高的农村流动人口更易接受城市主流文化^[5]。因此，居住环境、受歧视程度、和方言掌握程度等反映社会融合的变量对观念和行有重要影响。

农村妇女外出务工颠覆了传统的社会性别角色和劳动分工^[6]，其婚育观念及行为的改变比男性更为显著^[7]。由于迁移流动的选择性，农村流动人口的年龄集中分布在18~45岁，18~35岁的农村流动女性更占到了91.2%^[8]。随着这一处于生育旺盛期的社会群体、特别是农村女性流动人口规模的不断扩大，其婚育观念和行为的转变必然对中国人口的发展产生深远影响。郑真真^[9]通过对农村劳动力流出地的调查，比较深入地研究了外出经历对农村妇女初婚年龄的影响，发现有外出经历的妇女的初婚年龄明显大于没有外出经历的妇女，向城市的流动提高了农村妇女的初婚年龄。然而到目前为止，对滞留在城市中的农村流动妇女的初婚观念与行为还缺乏深入研究，特别是还较少见到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合对城市中农村流动妇女初婚观念与行为影响的定量研究。本文试图根据对城市中农村流动妇女的问卷调查数据，详细考察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合对滞留在城市的农村流动妇女的初婚观念和行有影响。

二、主要影响因素分析

1. 社会网络因素

根据互动的频率的高低、感情力量的深浅、亲密程度的强弱、互惠交换的多少，个体（个人、组织）之间的关系可分为强关系和弱关系，强关系是在性别、年龄、教育程度、职业身份、收入水平等社会经济特征相似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而弱关系是在社会经济特征相对不同的个体之间发展起来的^[10]。在农村流动人口求职过程的研究中，有学者根据农村流动人口的特征，将强关系界定为以“血缘”和“地缘”为主的家属、亲戚和老乡，弱关系界定为以“业缘”和“友缘”为主的朋友、同事和老板等^[11]。与社会网络中的强关系相比，弱关系通常具有与个体相异的观念与行为，对个体观念与行为的转变发挥着更大的作用。因此，以“弱关系”为主的农村流动人口的初婚观念和行有，更容易趋同于城市市民。

2. 社会融合因素

“居住环境”、“在城市的受歧视程度”和“当地方言掌握程度”等变量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状况。农村流动人口在城市的居住方式分为两类——聚居（可分为工棚式和村落式聚居）和散居（可分为租房式和进入家庭式散居）。居住环境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农村流动人口的职业和社会融合程度。从事建筑业和大型加工业的多属于工棚式聚居，与市民和主流文化相对隔绝；个体工商业者和自由职业者等多属于村落式聚居，与市民和主流文化也较少接触；从事商业、服务业的多采取租房式散居，保姆或借住亲戚家的主要采取进入家庭式散居，他们不与老乡发生紧密的协作关系，生活方式与当地常住人口已无大的差别^[12]。因此，散居妇女的社会融合程度较高，初婚观念和行有更容易趋同于城市市民；而聚居者与主流文化相对隔绝，初婚观念和行有不易趋同于城市市民。受歧视程度反映了在城市的社会经济地位，受歧视程度越高的

越不易与城市主流社会融合。当地方言通常被当作一种衡量外来人口市民化程度的标准^[13]，方言掌握好的社会融合也较高^[14]。

3. 流动因素

研究证明，外国移民在接受国的融合要经历定居、适应和完全同化三个阶段^[15]。不同于西方国家的永久性迁移人口，中国大城市中的农村流动人口是一种暂时性迁移，他们中的大部分可能只经历了所谓的“定居”和“适应”过程。在迁移流动的短期内，人们通常先要解决工作、住房等问题后，才能较从容地完成婚姻大事^[16]。绝大多数农村妇女在城市的工作紧张、生活和居住环境也较差，不利于婚姻的形成。因此，短期流动的不稳定性，在客观上引起初婚行为的被动性改变，带来实际婚龄的提高。另一方面，外出务工打破了农村妇女传统的社会性别分工^[17]，在城市的经历见识也有利于改变她们原有的乡土价值观念。随着在城市滞留时间的延长，社会融合程度不断提高，有些个体甚至进入完全同化阶段，其初婚观念与行为可能发生彻底转变。

4. 个人因素

个人的结婚年代反映了社会、经济、文化和相关政策，对初婚有重要影响。教育水平、收入和职业等也是影响初婚的重要因素，其中教育起到了最重要的作用，高教育和高收入的女性婚龄较大^[18]。个人的家庭情况，如家庭权力结构和经济状况等对初婚也有影响。个人因素不但直接影响初婚，还通过影响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合间接地对初婚产生影响。

三、研究设计

1. 数据

本文所用数据来自 2002 年复旦大学与西安交通大学合作进行的上海市“浦东新区外来人口调查”。调查对象为 15~49 岁的非上海户籍育龄妇女。调查首先从浦东新区 24 个街道与乡镇中随机抽取 4 个，再将 4 个街镇的流动人口登记名册作为抽样框，利用简单随机抽样法进行抽样。调查内容涉及基本状况、婚姻与家庭、生育与养老以及社会交往等，共收回有效问卷 1015 份。

2. 方法

第一，利用 OLS 回归模型分析妇女的理想初婚年龄。由于调查提供的是已婚妇女目前的理想初婚年龄，这种婚姻观念不会对初婚行为产生影响，但已受到城市文化的影响。要去除那些流动前初婚的农村妇女。第二，为了研究流动后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合对实际初婚年龄和初婚风险的影响，利用 OLS 回归模型分析流动后才结婚的妇女的实际初婚年龄。第三，利用独立样本 T 检验，比较流动后初婚与流动前初婚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后者基本反映了中国农村或小城镇的初婚年龄模式，而前者反映了受流动影响的初婚年龄模式。由于有些妇女在初次进入浦东以前有在其他城市打工的经历，可能对初婚行为产生影响，因此样本中去掉了这些妇女。第四，应用 Cox 回归模型分析自初次流动后 5 年内结婚的风险。

3. 变量设置

两个 OLS 回归模型的因变量分别是理想初婚年龄和实际初婚年龄，COX 回归模型的因变量是妇女初次流动后 5 年内结婚的可能性。三个模型的自变量均为“社会网络”、“社会融合”和“流动”因素。

“社会网络”包括“社会支持”、“当前的社会交往”和“当前的主要信息源”三个变量。“社会支持”是指“在遇到困难时主要向谁寻求帮助”，分为强关系（家属、亲戚、老乡）和弱关系（朋友、同事、老板等）。由于调查没有明确指出“社会支持”的时限，本文认定它是一个基本不随时间变化的量，将之纳入所有三个回归模型中。“当前的主要社会交往对象”和“当前的主要信息来源”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社会讨论网的作用。由于调查中的主要社会交往和信息来源明确限定为目前的情况，不能对已经发生的初婚行为产生影响，所以不能纳入对实际婚龄和初婚风险的分析。

“社会融合”包括“居住环境”、“受歧视频率”和“当地方言掌握程度”三个变量。根据有关研究，再次职业流动后，绝大多数城市农民工的社会地位没有发生变化^[19]，而农村流动人口的居住环境与其职业密切相关，专业技能的普遍缺乏使之接受职业再培训的比例也很小^[20]，不大可能改变职业类型和居住方式。同时，受歧视的频率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社会地位。因此，本文视居住环境和受歧视的频率为基本不随时间变化的量，将之纳入所有的三个回归模型中。由于对流入地方言的掌握程度是一个明显随时间变化的量，因此只被纳入对目前理想婚龄的分析模型中。

“流动因素”是指在浦东的滞留时间，在对理想婚龄的分析中是指妇女初次进入浦东的时点与调查之日时点之间的时间长度，在对实际婚龄的分析中是指妇女在初次进入浦东的时点与妇女初婚的时点之间的时间长度。

控制变量是“个人因素”，包括“年龄”、“教育”、“近半年的月收入”、“结婚年代”和“外出打工决定权”。为了反映不同年龄段妇女的婚姻观念，对理想婚龄的分析中加入了年龄；为了反映社会经济发展和文化变革对实际初婚年龄的影响，在分析中加入了“结婚年代”。“外出打工决定权”反映了妇女在家庭重大事务中的自主能力，会对妇女的初婚行为产生影响，因此纳入对实际婚龄和初婚风险的分析中。

在模型中选择这些变量主要是它们对初婚年龄在理论上有影响，而且调查能提供相应的数据。其他一些变量对初婚年龄可能也有影响，但调查中没有涉及或信息不完全，例如妇女的家庭状况、婚前的收入、职业、以及有关社会网络其他详细信息等。由于一些妇女的信息不完整，对于理想婚龄、实际婚龄和初婚风险的分析，分别只能使用 324、189 和 362 名具有完整数据的样本。

4. 研究假设

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结合浦东调查数据的特点，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一：社会网络以“弱关系”为主的农村流动妇女的初婚观念和行为更容易趋同于城市市民。

假设二：社会融合程度高的农村流动妇女，初婚观念和行为更容易趋同于城市市民。

假设三：流动使得农村妇女的初婚观念和行为逐渐趋同于城市市民。

四、结果

1. 理想初婚年龄

表1显示，在社会网络变量中，只有当前的社会交往对理想婚龄有显著影响。与主要交往对象以老板、当地的同事或朋友等弱关系为主的妇女相比，主要交往对象以外地打工者为主的妇女理想婚龄较低。在社会融合变量中，只有居住环境对理想婚龄影响显著。与散居的妇女相比，聚居妇女的理想婚龄明显要小。在城市的滞留时间对已婚妇女的理想婚龄没有显著影响。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越高的妇女理想婚龄越大。研究还发现，所有已婚妇女的理想平均婚龄和实际平均婚龄分别为 24.68 岁和 23.68 岁，理想平均婚龄比实际平均婚龄高出整整 1 岁，对于二者差异的T检验结果亦非常显著。

2. 实际初婚年龄

表1显示，社会支持对实际初婚年龄的影响不显著，而居住环境对实际初婚年龄有显著影响。与散居妇女相比，聚居以及混居妇女的实际初婚年龄明显要小。婚前在城市的滞留时间对妇女的实际初婚年龄有显著影响。当妇女婚前在城市的滞留时间达到 5 年以上时，其初婚年龄明显大于那些滞留不到半年的妇女。教育水平达到初中水平的妇女的实际婚龄明显小于只接受过小学教育或没有受过教育的妇女。

表 1 对理想婚龄、实际婚龄和初婚风险的模型估计结果

变量	OLS 回归模型 B 值		COX 回归模型Exp (B)
	理想婚龄	实际婚龄	初婚风险
社会网络			
社会支持: 弱关系 (强关系)	0.16	0.22	0.92
当前的社会交往:			
外地打工者 (老板/当地同事朋友)	- 0.51*		
老家来的亲戚	- 0.12		
其他	0.73+		
当前的主要信息来源			
当地人: 是 (否)	- 0.10		
家乡人: 是 (否)	0.12		
外地打工者: 是 (否)	0.05		
大众媒介: 是 (否)	0.22		
社会融合			
居住环境: 聚居 (散居)	- 0.53+	- 2.00+	1.87***
混居	0.11	- 1.78*	1.79**
受歧视频率: 偶尔 (经常)	- 0.30	0.04	1.26
从未	- 0.37	0.74	1.38
方言掌握程度: 只能听懂 (会说)	- 0.18		
根本不会	0.04		
流动因素			
在城市滞留时间:			
半年到 1 年 (半年以下)	- 0.17	1.21	
1 年到 3 年	- 0.20	1.12	
3 年到 5 年	- 0.60	1.54	
5 年以上	- 0.38	2.37*	
个人因素			
年龄: 26~ 30 岁 (25 岁及以下)	0.46		
31~ 35 岁	0.42		
36 岁及以上	0.24		
教育: 初中 (小学以下)	0.23	- 1.25*	1.36+
高中以上	1.31**	- 1.14	1.68*
近半年月收入:			
501~ 1000 元 (0~ 500 元)	0.37+		
1001 元以上	0.67*		
结婚年代: 1991~ 1995		0.97	
1996~ 2000		1.35	
2001+		0.71	
外出决定权: 其他人 (自己)		- 0.23	1.03
R ² / - 2LL	0.17***	0.13*	2933***
样本数	324	189	362

数据来源: 2002 年上海市“浦东新区外来人口调查”。***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另外，与那些结婚后才初次流动的妇女相比，流动后结婚的妇女平均初婚年龄明显要大，这种区别在不同时代都非常显著 (见表 2)。并且，从两个婚姻队列的两类妇女样本量的变化还可看出，在 1995 年以前结婚的流动妇女中，大多数妇女是结了婚以后才外出务工，而在 1996 年以后结婚的流动妇女中，情况发生了逆转——大多数妇女外出务工后才结婚。

3. 流动后 5 年内的初婚风险

表 1 显示，社会支持对妇女初次流动后 5 年内的结婚风险没有显著影响，居住环境对实际初婚年龄有显著影响，与前面的分析结果一致。与散居的妇女相比，混居和聚居的妇女更倾向于早婚、其中聚居妇女的初婚风险最大，最可能早婚。教育水平较高的妇女初婚风险较大、更可能早结婚。受过初中和高中以上教育的妇女初婚风险均显著大于只接受过小学教育或没有受过教育的

妇女，其中受过高中以上教育的妇女初婚风险最大、最可能早婚。

表 2 流动前与流动后初婚妇女的平均初婚年龄				岁
结婚年代	1995 年以前	1996~ 2001 年	总和	
样本量	302	230	532	
流动前初婚	22.78 (229)	24.07 (70)	23.08 (299)	
流动后初婚	25.50 (73)	25.82 (160)	25.72 (233)	
T 检验	***		***	

数据来源：同表 1。

注：上表年龄右侧的 () 中为样本量； *** $p < 0.001$ ** $p < 0.01$ * $p < 0.05$ + $p < 0.1$, ns 不显著。

五、讨论与总结

本文利用“浦东新区外来人口调查”数据，系统定量地研究了农村妇女流入城市后的社会网络和社会融合对她们初婚观念和行为的影 响。本文的假设基本得到验证。

首先，在社会网络变量中，与本文的假设相符，当前社会交往对流动妇女的理想初婚年龄有显著影响：与社会交往以弱关系为主的妇女相比，社会交往以强关系为主的妇女，理想婚龄明显要大。但是，社会支持对理想婚龄、实际婚龄和初婚风险都没有显著影响，当前的主要信息源对理想婚龄也没有显著影响，这一结果没有支持前面的假设。这可能是因为，由于“浦东新区外来人口调查”不是专门研究社会网络及其影响的调查，缺乏社会网络的详细信息和针对于婚育观念的社会讨论网的测量，本文以实际支持网络来代表社会支持网络、以涵盖内容较广的主要信息源来代表有关婚育观念的社会讨论网，针对性较差，也缺乏社会网络随时间变化的信息，可能对结果产生了一定影响。

其次，在社会融合变量中，与本文的假设一致，居住环境对流动妇女的理想婚龄、实际婚龄和初婚风险都有显著影响，与混居和聚居的妇女相比，散居妇女的理想婚龄和实际婚龄最大、初次流动后 5 年内结婚的风险最小。但是，受歧视频率对理想婚龄、实际婚龄和初婚风险的影响均不显著，方言掌握程度对理想婚龄的影响也不显著，这尚待进一步的研究。

最后，与本文的假设一致，向大城市的流动对农村女性的婚龄有重要影响，流动后初婚妇女的初婚年龄明显大于流动前初婚的妇女，这与已有的研究结果一致^[21]。同时，在城市滞留时间只对实际婚龄有显著影响，而对理想婚龄没有显著影响，这尚待进一步研究。当婚前在城市滞留时间达到 5 年以上时，初婚年龄明显大于那些婚前在城市只滞留了不到半年的妇女，有力地证明了本文的假设。

本文还有以下几个发现。第一，已婚妇女的理想平均婚龄明显高于实际平均婚龄，说明流动妇女的婚姻观念有融合于城市市民的趋势，尽管这种观念的改变不能再对其婚姻行为产生影响，但可以影响到周围和家乡的未婚妇女，推动农民婚育观念和行为的转变。第二，1990 年代后期农村妇女的外出模式发生了转变，从原来的以流动前初婚为主转变为以流动后初婚为主，这与有的研究一致^[21]。第三，受教育水平较高的妇女理想婚龄较大，但实际婚龄较小、初婚风险较大。这可能是因为，分析样本中受过大学教育的分别只占 1.1% 和 0.8%，不足以发挥教育对初婚的制度效应（即因在高校受高等教育而推迟结婚）。对于农村流动妇女而言，经济能力、稳定的工作和生活环境是结婚的现实必要条件。与只有小学程度的妇女相比，有中学教育程度的妇女更容易找到收入较高的工作，她们在环境适应性、生活稳定性和经济实力方面都比前者更具优势，更容易满足初婚的基本条件。

本文的研究和发现还存在一定局限性。首先，由于“浦东新区外来人口调查”并不是为专门研究初婚观念与行为而设计的，因此一些已经被发现影响实际初婚年龄和初婚风险的重要变量并没有包括在调查问卷中，这无疑对研究结果有一定影响。其次，由于缺乏流动妇女流出地的具体经济社会数据和资料，再加上妇女流出地较为分散，无法测量和估计流入地的经济社会情况对初婚行为的影响。最后，在浦东所观测到的影响妇女初婚的因素，是否存在于其他流动人口流入地，仍然需要做进一步的研究。

(参考文献见第 47 页)

2. 改革事业单位人事制度。事业单位重点是推行聘用制和岗位管理制度, 管理人员实行职员制度。合理设置专业技术岗位, 竞聘上岗, 择优聘用。逐步实现专业技术职务聘任与岗位聘用的统一。要抓紧制定配套规定, 明确职位设置、公开招聘、合同管理、工资待遇、解聘辞聘等方面的政策。要充分发挥事业单位人事制度改革联席会议制度的作用, 及时加强协调沟通, 共同研究解决改革中遇到的各种难题。

3. 对企业经营者实行职业化管理。企业要以建立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选拔任用制度、考核制度、激励机制, 监督约束机制为主要内容, 深化人事制度改革。以资产为纽带, 建立经营者分层分类管理体制, 取消国有企业和企业领导人的行政级别。实行经营者任职资格制和聘任制。建立经营者人才市场和企业经营者人才评价推荐中心, 引入市场机制选拔企业经营者。进一步完善企业经营者年薪制。将

经营者薪酬与其责任、业绩直接挂钩。鼓励企业从重奖激励转到入股提成激励为主, 对经营者实行期权、股权激励; 使经营者与企业构成利益共同体, 进而形成命运共同体, 促进企业的持续发展。

(七) 加快人力资源市场体系建设

广东应借鉴美国发展人力资源市场的经验, 建设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人力资源市场。扶持省人才市场、中国南方人才市场, 省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市场和深圳人才大市场; 开放民间资本和外国资本以合资的方式进入广东的人才中介领域。要建立现代化的人力资源信息网络和人力资源数据库, 加快实现人才市场与劳动力市场、高等学校毕业生就业市场的沟通, 实现人力资源信息互通、资源共享。以促进人力资源市场由集市型向网络传媒型转变, 充分发挥市场对人力资源配置的基础性作用。

[责任编辑 崔凤垣]

(上接第 58 页)

参考文献:

[1] 阳建强, 吴明伟. 现代城市更新. 东南大学出版社, 1999: 125- 247.

[2] 曹子玮. 农民工的再构建社会网与网内资源流向. 社会学研究, 2003, (3): 99- 110.

[3] 李汉林. 关系强度与虚拟社区. 农民工—中国进城农民工的社会经济分析.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3: 96- 115.

[4] 王春光. 温州人在巴黎: 一种独特的社会融入模式. <http://www.cass.net.cn>, 2003.

[5] 王春光. 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 社会学研究, 2001, (3): 63- 76.

[6] Sikey, R. 2003. Engendering social capital: Women workers and rural- urban networks in Indonesia's crisis. *World Development* 31 (5): 865- 879.

[7] Goldstein, A., M. J. White and S. Goldstein. 1997. Migration and fertility in Hubei province, China. *Demography* 34: 481- 492.

[8] 白南生等. 回乡, 还是进城: 中国农村外出劳动力回流研究.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02.

[9] 郑真真. 外出经历对农村妇女初婚年龄的影响. 中国人口科学, 2002, (2): 61- 65.

[10] Granovetter, M. 1973.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78.

[11] 边燕杰, 张文宏. 经济体制、社会网络与职业流动. 中国社会科学, 2001: (2).

[12] 蔡 . 中国人口流动方式与途径 (1990—1999).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01: 305.

[13] 刘玲. 都市里的村民: 中国大城市的流动人口. 北京: 中央编译出版社, 2001.

[14] 同 [5].

[15] Sawy, A. 1966, *General Theory of Population*. New York: Basic Books, Inc., pp. 460- 461.

[16] 郭志刚, 段成荣. 北京市人口平均初婚年龄的研究. 南京人口管理干部学院学报, 1999, (2).

[17] 同 [6].

[18] Büdlerl, J. and A. Diekmann. 1997. Education and marriage: A comparative study. www.sowi.uni-mannheim.de.

[19] 李强. 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分层结构.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2002.

[20] 同 [12].

[21] 同 [9].

[22] 同 [8].

[责任编辑 王树新]